

山里的歌声，曾经是我乡居岁月中除阅读之外的最大的精神慰藉。

我说的乡居岁月，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常讲的知青上山下乡时插队落户的日子。

每当挑了一天沉甸甸的担子，踏着暮色挑着空箩筐走回村寨的路上；每当勾着腰，光脚站在水田里整整蹲了一天秧子，在清凌凌的水渠边洗净了手、足的时候；每当顶着烈日，在密簇簇的苞谷林里，避闪着锐利撩人的苞谷叶子，薅完苞谷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的时候，只要听到山谷里、岭巅上或是树林边响起歌声，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收住脚步，站停下来，或者是干脆倚靠着树干，享受一般凝神聆听着由远而近的歌声。

在艰辛、繁重、肩挑、背扛几近原始状态的农事劳动之后，我也时时感觉到远远近近传来的歌声，是我的一种享受，是我极难遇到的精神食粮。

后来我也有机会在宫殿一般的莫斯科大剧院、百老汇音乐厅，上海、北京的大剧院、音乐厅里听过无数次演唱，不少歌曲和剧目还是举世闻名的作品，我能感觉那歌声好听，我能欣赏那名剧演绎得精湛，但我从来没有感到那种精神上从心里透出来的享受。有几次，我甚至还会产生这剧目怎么还不结束的感觉。

我始终在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爱听苗族的飞歌。修建湘黔铁路时，借宿在纯苗地区的寨子上，秋冬之交天色晴好的日子，苗族的小伙和姑娘们在对歌时，放声纵情唱出的颤悠悠的飞歌，我只觉得那歌声从高远的空中抛洒下来，我只感到那歌声能把千山万岭，把郁郁葱葱的苗岭唱醒过来，我只以为峡谷深处、重安江面上洒遍了歌的旋律，仿佛那山、那水、那绿色的山野都在伴奏。

对于他们来说，唱歌是同吃饭、同日常的劳动一样重要的事情。我理解，歌儿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

“话题交关多，听依嘎讪胡”，吃罢晚饭，不少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个内容，就是听滑稽演员舒悦“嘎讪胡”。

“嘎讪胡”，用文字语言说，叫做“沪语民生资讯脱口秀”。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用上海方言闲聊，就是上海方言闲聊。北京话“侃大山”，四川话“摆龙门阵”，山东话“拉呱”，东北话“唠嗑”，广东话“遛(liu)听”，都是一个意思。

早上醒来迟了，一看腕表，时间已是五点四十分。休息天，骑车去！心动，马上行动，一个人更容易付诸行动。

今天的目标——松江车墩。清晨的空气凉爽更清爽，一路上人车稀少，三十多公里的路途，三挡七速，全速飞奔。不知不觉汗湿全身，无比的酣畅淋漓。一个人骑行，我可以这样骑得飞快，享受一个人的狂欢，挑战自我的极速；偶尔也愿意放慢车轮，欣赏沿途的风景，也可以随意思考，享受一个人的慢时光。

开车速度太快，走路速度太慢，因此只有自行车骑行的速度才能最好地领略沿途的美景。认真回忆一下，爱上骑行已近三年，彼时，电影《转山》在骑行圈很火，周围的同事、同学都在探讨着书豪在完成哥哥遗志，从丽江到拉萨的骑行历程。书豪在途中面临诸多困难，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依然坚持并最终完成征程的那种意志力让我为之动容。

《转山》，让我看了就想出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三年来，时而一个人在路上，时而两三好友临时组合，时而一群人一起出发。骑行，时而在公路，时而在乡间，时而在山麓。一个人骑行的时候可以骑得很慢，这个时候骑行可以思考；一个人骑行的时候也可以骑得很快，这个时候骑行是挑战自我；一群人骑行时，速度则是团

山里歌声

叶辛

无穷的情趣。哦，原来古老的水族早就有了这种歌唱之间道白的演唱形式，原来他们的歌谣同样抒情，同样讲究意境、格律、韵味，原来他们的歌不仅能给舞蹈伴奏，还能活跃气氛，还能在歌声和道白中讲述民族的历史，做人的道理，一句话，水族的双歌是从水族特有的生态环境都柳江畔诞生的。

我更迷醉于布依族的山歌。一首《好花红》唱遍了中国，传到了世界上。《好花红》乡里唱得漫山遍野里是红花，唱得四面八方的客人们都来争睹好花如何红，好花如何香，“贵人来了花就红，好花就等

着贵人来”成了县里、州里、贵州省里欢迎客人的歌声。而一首《哥哥哥哥你好狠心》的诙谐歌曲，不怕唱得你不笑出来。我最爱听的是布依族独有的《八音坐唱》，年轻时第一次听到《八音坐唱》里的歌词：“鸟儿才搭窝，戏水的鸳鸯才下河，哥哥啊，你就忍心离开我……”

我就坐下不走了，一直听到整首歌曲唱完，那透着新婚少妇哀怨的曲调儿，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百听不厌的是侗族的大歌。“要是年轻不唱歌，会把人愁坏”这一首《十九岁才知珍惜十八岁》是我在鼓楼下的歌堂里听到的，从听到侗族大歌的那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侗族姑娘们比淙淙潺潺的清泉还要纯净脆亮美妙的歌声。上世纪八十年代，从

叫杜宝林，以说事新闻作为内容，讽刺官府及社会，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他自称“小热昏”。其实，杜宝林的脑子一点也没有热昏。他很聪明，不过是借说新闻的名目，来抨击时弊而已。独脚戏没有乐器的伴奏，但有说有唱，和曲艺接近。尔后，在江南一代，出现了一种叫“说潮报”的艺人，流动说唱新闻。用地方的方言演唱，为了抓住听众，在说唱中穿插一些滑稽小故事和笑话。据著名滑稽演员范哈哈回忆：“独脚戏的名称，是前辈艺人王无能提出的。王无能先生早年在上海汕头路笑舞台演通俗话剧，有时在戏中串戏，一个人演几个角色，没有助手搭配，也没有锣鼓协助，演出很受欢迎。后来他退出通俗话剧团，和钱无量搭配，组成一档相声单独演出。”

1927年，“新世界游乐场”老板娘做寿，请王无

能、钱无量去唱堂会，大获成功。老板娘觉得他俩的演出形式能叫座赚钱，便以重金聘请王、钱在“新世界游乐场”公演，并正式亮出“独脚戏”的招牌。此举果然轰动上海。从此，滑稽戏就从堂会走向了舞台。王无能被誉为“滑稽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活人”。代表作有《哭妙根笃爷》、《各地堂倌》等，还灌制了20余张滑稽戏唱片。王无能给别人带来了笑声，但自己生活并不快乐。因嗜鸦片，吃尽当光，一生潦倒，于1933年去世，只活了41岁，死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

“独脚戏”又称“踱脚戏”。据笑嘻嘻说：“这是由于演出的内容都是艺人们在街头巷尾‘踱方步’踱出来的。”范哈哈回忆说：“早年的踱脚戏，每档的表演时间约半个小时，说唱也好，化妆表演也好。笑料的效果，像连珠炮一样，从始至终，演员们都能使观众发笑。从前表演踱脚戏，常常不预订节目，上台之前，随机应变，观众

法国总统府发出邀请，由总统夫人亲邀贵州纯朴的侗族女子到法兰西演唱。在省城贵阳集中的时候，她们住在省文联的招待所，门窗就对着我的办公室，那些天里，她们天天在那里唱着侗族大歌，把天籁般的歌声送进我们整个文联的办公室，我可以说是享尽了耳福，成了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这些侗家妇女，去了法国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欧洲各国的邀请，一去就去了一个多月，一唱就唱遍了欧洲十一个国家。

是啊，山里歌声，终于唱出了贵州的大山，唱出了苗乡侗寨，为世人所知，为世界所知。

山乡里的歌声，是民族的瑰宝，它总会熠熠闪光，总会传遍祖国大地、传遍世界。

能、钱无量去唱堂会，大获成功。老板娘觉得他俩的演出形式能叫座赚钱，便以重金聘请王、钱在“新世界游乐场”公演，并正式亮出“独脚戏”的招牌。此举果然轰动上海。从此，滑稽戏就从堂会走向了舞台。王无能被誉为“滑稽鼻祖”，被誉为“天下第一活人”。代表作有《哭妙根笃爷》、《各地堂倌》等，还灌制了20余张滑稽戏唱片。王无能给别人带来了笑声，但自己生活并不快乐。因嗜鸦片，吃尽当光，一生潦倒，于1933年去世，只活了41岁，死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

“独脚戏”又称“踱脚戏”。据笑嘻嘻说：“这是由于演出的内容都是艺人们在街头巷尾‘踱方步’踱出来的。”范哈哈回忆说：“早年的踱脚戏，每档的表演时间约半个小时，说唱也好，化妆表演也好。笑料的效果，像连珠炮一样，从始至终，演员们都能使观众发笑。从前表演踱脚戏，常常不预订节目，上台之前，随机应变，观众

曾经，听到媒体呼吁“生态葬”一说。为了节省土地，为了发扬现代文明的好风气，提倡“江葬”、“海葬”、“树葬”、“草坪葬”。

二十多年前，我为死去的母亲在海滨地区置了一块墓地，让母亲“入土为安”，尽了孝道。当风雨交加或雷打电闪的夜晚，我总会想到墓碑上母亲的照片，

此时遭受着风雨的侵袭，心在隐隐作痛。清明、冬至扫墓时，我总是首先把母亲的照片仔细地擦干净，抹去风雨留下的尘埃，像是抚慰着母亲。尽管如此，母亲照片终年受蚀，难解我心头之结。很多年后，才慢慢释然。

后来，我看到黄永玉大师的一句话：“我将来的骨灰是最好的肥

料。”这大大地启发了我。对呀，我特别欣赏“树葬”、“花葬”甚至“草葬”，让故者回归大自然，与大地融为一体，绿草为伴，红花为伍。

可以想象，这也算是死者对生者一份最后的礼物，让庄稼茂盛，花树更艳，后代子孙也能和亲人接近，这是一种最好的缅怀了。

国土资源是有限的，每年大量墓穴占去多少土地？由此看来殡葬习俗的改革刻不容缓。身边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从不接受到接受，传统的观念在发生更切合现代文明发展的转变，这是好事。

每次去市里开会，“奉贤”的座位旁边总是很亲切的两个字：崇明。好几年前我在文化系统工作时，我和邻座的崇明兄弟一样，总是比其他区县的同志要早到，一个是怕路上堵车，提前两个半小时就出来了；一个怕轮渡停航，提前一天就到市里了。我们总能不约而同地找到很多共性的话题，有时要么相互揶揄，要么互相吹捧几句，但更多的是彼此的勉励，大有“惺惺相惜”之势。

这几年来工作单位、从事的部门换了几茬，也就认识了不少邻座崇明的朋友，特别是隧桥通车以后去崇明的机会也多了，除了工作原因外，我去崇明大多与喜欢吃崇明土菜有关，为什么要加个土字呢？因为那里有我认为比较纯正的本帮菜，更通俗点讲就是本地农家菜。而奉贤这两年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开饭馆的许多也是安徽人，四川人居多，北方菜和湘菜丰富了我们的菜系结构，甚至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即使本地人开的菜馆也或多或少迎合外来客，而崇明就可以吃到没有被改造过的当地菜。大前年的国庆，应崇明诗人茂盛的邀请上岛，之后一个叫“锦绣”的饭庄一直撩拨着我还算挑剔的味蕾。前年、去年的国庆，我相约一拨兄弟去那里，我点菜一贯秉承“肉食主义”精神，“五荤六素”在我的食谱里基本上是十荤一素，这盘菜搞不好也就是白菜炒肉丝之类的，我还像当地人一样一为大家点评。但两次下来，都没有第一次饭那么轻松地征服我，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有第三次去的冲动。

对大部分市区人来说，对奉贤最初的印象也就是菜花节、伏羊节，现在有了东方美谷。在他们眼里，奉贤也代表了上海的农家菜。菜花节、伏羊节也好，大抵也与吃有关，为什么这么说？伏羊节很明显，三伏天，吃羊肉喝烧酒；菜花节正是大家踏青的好时节，“来菜花节，品农家菜”成了一些久居城市的“阿拉上海人”“三月下奉贤”的一个理由，青团、米糕，菜花螺蛳、腊板鲫鱼，样样都不能少。伏羊节就是披着节日外衣的农家菜盛宴，“羊头汤”是伏羊节的菜魁，一般用来招待重要客人。“羊头汤”有讲究，首先要选用未经冷冻的本地散放羊，煮的时候必须放适量的羊杂，特别是羊血，起锅前再放上一大把本地大蒜茎叶，那色香味没的说。“伏羊节”十年下来，也演变成了到奉贤吃羊肉的习俗。现在不管是在三伏天还是三九严寒，奉贤的农家菜桌上除了白切鸡，都会有羊肉，热气的或白切的。

其实崇明菜、奉贤菜也好，伏羊节、菜花节也罢，我们怀念的都是渐渐离我们远去的乡愁，我们的味觉也或多或少接受了乡愁的滋养。回得去的是家乡，回不去的是故乡，不管变化多大，家依然在那里，但我们的故乡，我们记忆中的家乡，那陪伴我们童年少年的清澈的沟渠，那掩映在菜花丛中的一抹老宅，都已不复存在。我们说的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干净、更诗意，真正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因为农村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爱吃的农家菜，更有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

喜爱什么套子，演员就做什么‘卖口’。所以，表演踱脚戏，上下手搭档一定要十分熟练，上手起一个笑话的引子，下手就要心中有数，接讲那些‘卖口’，所以百发百中，总能引得观众哈哈大笑。”到1930年，上海的“独脚戏”已发展到30多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目。看“独脚戏”，成为当时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内容。但是，今日之“嘎讪胡”，和90年前王无能的

点评。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

钱忠群